

日本女性教育家与女子学校（1868—1945）

周萍萍 著

日本女性教育家与女子学校

(1868—1945)

周萍萍◎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女性教育家与女子学校 (1868—1945) / 周萍萍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012-4333-4

I . ①日… II . ①周… III : ①妇女教育—研究—日本—
1868~1945 IV . ①G7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5648 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封面设计 田 林

书 名 日本女性教育家与女子学校 (1868—1945)

Riben Nüxing Jiaoyujia Yu Nüzi Xuexiao (1868—1945)

作 者 周萍萍 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65233645 (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680毫米 1/16 20½印张

字 数 330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333-4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关于近代日本女教育家版女校的思考

李　卓^①

2009年，青年学者周萍萍以论文《近代日本女教育家及其女子学校的研究》获得了南开大学的博士学位。此后，作者认真而严谨地对论文进行了修改与补充。从博士论文选题到出版，体现了作者对日本教育乃至日本社会发展的独特的观察角度及思考。

高素质的国民是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女性则是人力资源之母。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技术的发展是核心，人的现代化是主体，而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的知识水平与教养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只用了短短几十年就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这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曾经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值得称道的事情。很多人都关注日本的教育事业，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事业中有一个鲜明的特色，这就是有很多优秀的女教育家兴办女子学校，从被动的受教育者成长为出色的教育者，在日本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日本女性教育家与女子学校（1868—1945）》的作者周萍萍以女性的视野，根据历史资料及实地考察，从女教育家创办女学校这一独特的角度，阐述了近代以来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该书的出版对认识与了解日

^① 李卓，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

本的教育乃至对认识与了解日本社会都有助益。

一

日本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根据“幼童不分男女皆须入小学”的原则方针兴办近代教育，用了不到40年，到1907年即开始实施六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当年女子入学率已达到96.14%。1947年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女子的入学率一直在99%以上。近代女子教育因何如此普及？《日本女性教育家与女子学校（1868—1945）》一书给了我们答案。

一是前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江户时代被称作“教育爆发的时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由于存在严格的身份制度，身处任何社会阶层的人都没有通过考试改变身份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预期，使教育在政治方面的功利性被大大削弱，学习知识的目的仅在于掌握自己从事的职业所需的技能，实用也就成为教育的最高价值。江户时代教育的最大特色是以寺子屋为中心的平民教育迅速发展。当时大约有45%的男子和15%的女子都识字，这种教育水平甚至连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因为即使是在歧视女性的年代，很多日本人对女性掌握文化知识也是持鼓励态度的，因此才有了女子接受教育的动力，寺子屋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已经把女性作为教育对象，在教育机构的准备、教育人才的储备、入学动员等方面，都为明治以后的近代女子教育的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公私并举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促进了民间办学。在近代日本教育体系中，私立学校始终有着合法地位，这是私立女校得以发展的制度保证。明治初期由于设立新学校需要大量资金，中央及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只能利用和改造江户时代的寺子屋，有些以江户时代寺子屋基础的私立学校得以发展起来。“学制”将“私塾小学”纳入近代学校体系，表明政府承认和鼓励民间私人办学。1879年颁布“教育令”时，明确提出了“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概念，赋予私立学校合法地

位。1899年8月，出台“私立学校令”，是第一个以私立学校为对象的教育法令，表明了私学在近代教育中的合法性，私立女校的生存与发展有了法律保障。

三是男女别学制度给私立女子学校提供了发展空间。1879年颁布的“教育令”改变了1872年“学制”规定的男女共学制度，开创了日本教育史上的男女别学体制，此后又多次强调在中等教育中实行男女别学，并通过发展高等女学校对女学生进行中等教育。当时公立女子教育机构尚不发达，官方开设的最高层次的学校只有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很难满足社会需求，而私立女子学校填补了由于政府忽视而带来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空白，客观上刺激了私立女子学校的发展，使私立女子学校一直占据培养高层次女性人才的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四是民间办学热情是近代女子学校发展的动力。发展女子教育，除了政府的政策与制度支持，更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在近代日本教育史上，始终有一批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发展女子教育，在近代教育发展不同阶段，都有不少教育家提出各自的女子教育理念，有的还亲力亲为办女校。如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1874年在东京创办同人社女子学校；1885年，留美13年的牧师木村熊二联合《横浜毎日新聞》主笔岛田三郎、历史学家田口卯吉、评论家岩本善治等人共同创办明治女学校，诗人北村透谷、马场孤蝶、作家島崎藤村等人都曾在此执教。近代日本公立女子学校基本上止于高等女学校即女子中等教育，到20世纪初期，舆论的主流仍然认为办女子大学为时过早。在政府不认可官办女子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民间的有识之士开始自发创办女子高等教育，出现了在女子高等教育中私立女校独树一帜的现象，可以说，日本女子高等教育首先是从私立女校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女子教育家成瀬仁藏1904年创办的日本女子大学。

五是培养良妻贤母的目标使女子教育得以立足。近代日本女子教育侧重对女子的性别教育，“良妻贤母主义”的教育理念贯穿于女子教育的全过程。在明治初期，女子教育的起步是从培养有知识的“贤母”做起的。到19世纪晚期兴办高等女学校时，明确提出培养良妻贤母的目标。“良妻贤母主义”教育是畸形的日本近代化的一个矛盾产

物，它将女性的作用局限在家庭之内，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同时也强调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有知识、懂学问是女子堪称贤与良的重要标准，亦有其积极、开明的一面。在日本，“良妻贤母主义”虽然在明治后期一度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但是，由于这种教育思想与战前日本的意识形态非常吻合，所以不仅作为国家公认的女子教育理念存在，而且一直是女性的行为规范和战前日本女性观的主流，可以说“良妻贤母主义”在日本是深入人心的，因此，这种教育的推广有着广泛的市场。

二

教育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在以造就良妻贤母为目标的近代教育中，培养出来的并不都是教育者们所希望的良妻贤母。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日俱增。周萍萍的《日本女性教育家与女子学校（1868—1945）》一书中，介绍了女子教育的成果——职业女性的出现。

近代科技进步与产业革命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仅仅依靠男性是远远不够的，通过接受近代教育而提高了文化素养的女性正适应了这一需要，一大批职业女性应运而生。比如，通讯部门为开设东京与横滨间民间电话通讯业务，于1890年首次招募15—25岁的女电话接线员，当时的招募条件除了未婚、品行端正、视听能力俱佳之外，就是笔算优秀，显然这是对受雇者的教育教养水平的要求。当时的九名入选者成为明星般的人物，女电话接线员也成为女孩子们憧憬的职业。19世纪晚期，除了大批女工进入产业工人行列之外，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女性的身影。最具典型性的有女教师、女医生等。

早在江户时代后期，在江户、京都、大阪等大城市中就涌现出很多女性经营的寺子屋及女师匠（教师）。在近代教育事业中，很多女性从被动的受教育者成长为出色的教育者。明治以后，随着女子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特别是政府大力发展女子师范教育，女教师人数日益增加。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女教师的人数几乎与男教员持平。在近

代日本教育发展史的各个阶段，都涌现出了一批女教育家以及她们独自或参与创办的女子学校，这些学校大多延续至今。女性办女校是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突出特色，由女性办女校，更能准确地掌握女性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实施适合女性的教育。

女医生最早出现于1885年，代表是毕业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和私立医学校好寿院的荻野吟子，她是通过医生开业资格考试的第一位女性，也是近代日本医学史上第一位女医生，恐怕在东方国家中也是最早的了。从此开启了女性行医之门。到1935年，日本已经有40多名女医学博士，3200名女医生，仅次于美国（8000余人）、英国（5000余人），居世界第三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女医生的产生和女医生队伍的壮大打破了男性主宰医学的传统局面，尤其是女医生在妇产科的出现，深受女性的欢迎。女性进入医生这一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从20世纪初期到大正时代，女性的就业范围进一步扩大，“职业女性”、“摩登女”之类的词汇开始流行。据统计，1923年仅东京市的职业女性就达到43万人之多；1930年，全国的女性求职者就有87万多人，几乎所有行业中都有了女性的身影。女子就职的理由，除了为解决生活所需之外，追求自由、独立是重要的因素。虽然当时的女性在就业数量上还属于少数，报酬和待遇都比较低，然而这批走向社会、取得一定经济自立的女性可以称得上是“新女性”思想最早的实践者。她们通过从事新的职业，密切了与社会的联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是20世纪初日本女性解放运动产生并发展的基础。

女性知识与教养的提高也促进了女性在政治上的觉醒。明治时代的女性很早就开始了争取参政权的努力。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不少女权活动家投身其中。20世纪初期，欧美发达国家女权运动的影响波及日本，1911年女性解放运动家平塚雷鸟与一批知识女性建立了青鞆社，并创办《青鞆》杂志，在发刊词中，写下了“原本，女性确实是太阳，是真正的人。如今，女性是月亮。依他人而生存，借他人之光而生辉，有着病人般苍白的脸庞”，第一次向世人提出了女性自身的真正价值在

哪里的疑问，“女性原本是太阳”的呼声，成为日本最早的“女权宣言”和女性争取自由的象征。此后，围绕在《青鞆》周围的进步女性和其他女性运动家一起，开始了真正的争取参政运动，只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压制而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毕竟经过了力量的积累，在战败后的1946年终于一举获得参政权，第一次参加选举就有70%的投票率，并有39名女性当选众议员。

三

周萍萍的《日本女性教育家与女子学校（1868-1945）》一书在对近代日本女教育家及其女子学校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中日两国的近代女子教育进行了比较及反思。近代以来，日本发达的女子教育与落后的中国女子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差距同样出现在两国的女教育家及女子学校的发展上。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国策的实施，迅速跻身于强国。曾几何时，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东隅小国突然间令中国人刮目相看。“甲午受创，渐知兴学”，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发展壮大，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仅靠“中体西用”并不能拯救中国，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文化教育制度，女子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对象，女子教育有了一定发展。但是，这个过程艰难而又缓慢。

首先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起步甚迟。封建礼教要求女性深居闺阁，足不出户，女子教育也只限于家庭而已。1875年，女教育家跡见花蹊创办第一所由日本女性自办的女子学校时，中国不仅没有自己的女子学校，就连倡导女子教育的人都几乎不存在。19世纪末期，日本开始发展女子中等教育，并不断涌现女性创办的女子学校时，中国才在1898年5月诞生了第一个由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塾），而且创办人为男性，女性只出现在教师行列而已。1900年，广东著名女诗人叶璧华在广东梅县独立创办了懿德女子小学，成

为近代中国女性中创办女子学校的第一人，它的出现比日本整整晚了25年。而且，近代日本女教育家们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并通过创办女子学校的教育实践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由此，在教育理念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奠定了她们的女子学校的百年根基。这些都是近代中国的女教育家们及女子学校所望尘莫及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事业之所以步履艰难，是因为还要面对一个特殊的障碍——缠足。缠足，无异于一种酷刑，它剥夺了妇女的行动自由，使妇女变成半残废，连家门都不易跨越，何以迈向学堂？当时的维新派已经清楚认识到“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因而大力倡导不缠足。所以，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起步，远比日本要艰难。它既要面对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且要首先解放自己的双脚。

其次是官办女学的创立更迟。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事业之所以能较快发展，主要是得利于政府的大力推动。明治政府早就注意到女子教育问题。1871年，派遣津田梅子、永井繁子等五名少女随岩仓使节团同时赴美国留学，并通过法律、政令敦促各级政府办学和女子入学，这无疑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保障。而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振兴中国女子教育的主张尽管已经比日本迟了20多年，却没有得到顽固、守旧的清政府的支持。19世纪末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由中国人创办女学的热潮，但仅仅是民间和个人的行为。在清政府于1903年颁布的“新学制”中，并没有承认和确定女子教育的地位。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仍将女学归入家庭教育法，即女子教育仍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直到1906年，迫于高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压力，清政府才不得不开始将女学列入学部职掌。1907年，始拟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从此才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有了位置。而就在同一年，日本已经开始实行六年制免费义务教育，适龄女孩几无不学之人，女子中等教育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再看看教育普及程度的差异。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官到民都重视女子教育，因此，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颇有动力。仅从女子中学来看，到明治末年已经有了209所，在校学生近七万人。日本女子教育的盛

况让清末赴日考察的官员及留学生大开眼界，也惊叹于旅馆的女勤杂工都能识字。相比之下，中国的女子教育情况与日本形成巨大反差。有资料统计，1915—1916年，中国各类学校女学生加在一起只有18万多人。难怪当时有人感叹：“女子教育无可言矣，若大学校、专门学校，女子竟无一校无一人，不更可羞耶？”另一项统计是，1922—1923年在全国1181个县中，有423个县没有女子初等小学，1161个县没有女子高等小学。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女童的入学率仅仅不足15%，大体相当于日本幕府末期的水平，两国的差距足以百年计。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落后，除了传统观念束缚、经济落后等原因外，不可忽视的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制约了教育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甲午战争之后，更是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当日本大力发展女子教育的时候，反帝、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维新派奋起救国，深感力量单薄，于是想到发动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参加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他们以不缠足和兴女学为出发点，争取妇女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解放。可见，倡办女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此时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热情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女子教育。对于长期受压迫的女性来说，争取个人的生存权力，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要比上学受教育更现实更重要。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像秋瑾那样的反封建的进步女士，当她走上革命道路之日，便不能不放弃做贤妻良母而抛夫弃子离家而去。在秋瑾同时或稍后，一批生长在较为开明的贵族家庭或知识家庭的女性，也不约而同地鄙视并拒绝贤妻良母的角色，进入到要求妇女解放和女子参政的队伍中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同样涌现出许许多多女革命家，论其影响，她们远远超出了女教育家。总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使广大中国妇女不可能像日本妇女那样在平和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国尚且难保，谈何有家？谈何有教育的发展？于是，被压迫与被奴役的社会现实一方面造就出远远多于日本的女革命家，另一方面却较少培养出杰出的女教育家。

《日本女性教育家与女子学校》作者周萍萍是一位非常刻苦、勤奋、好学的青年学者，该书的出版是她学术生涯的良好开端。当然，作为

新人新作，本书尚有不成熟之处，比如对不同时期女教育家及女子学校与国家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的把握还较为薄弱，对各位教育家及女子学校的叙述较多，对各自特征的分析还有所欠缺。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开拓视野，让研究不断深入。

2012年5月于南开大学

目 录

序 言	1
第1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4
第三节 方法及结构	18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22
第2章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确立与女教育家的诞生	25
第一节 前近代女子教育概观	26
第二节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确立和发展	38
第三节 近代日本女教育家的诞生	55
第3章 实施欧式女子教育的女教育家与女子学校	66
第一节 教会女子教育的代表——矢島楫子与女子学院	67
第二节 欧式女子教育的典范——鳩山春子与共立女子学园	85
第4章 固守传统女子教育的女教育家与女子学校	103
第一节 儒教保守教育的固守——跡见花蹊与跡见女子学校	104
第二节 “女子本分教育”的提出 ——三轮田真佐子与三轮田女子学校	122

第三节 良妻贤母主义教育的集大成者 ——下田歌子与实践女子学校	140
第5章 主张实学女子教育的女教育家与女子学校	163
第一节 实学女子教育的开创——吉冈弥生与东京女医学校	164
第二节 专业女子教育的发展——津田梅子与女子英学塾	183
第6章 倡导自由人格女子教育的女教育家与女子学校	204
第一节 女性人格教育的实施——安井哲子与东京女子大学	205
第二节 自由主义教育的倡导——羽仁元子与自由学园	224
第7章 结语	245
第一节 近代女教育家与女子学校大量产生的 社会背景与主要因素	245
第二节 女教育家及其女子学校在近代日本教育史中的 地位及评价	252
第三节 关于近代日本女教育家及其女子学校的 局限性的思考	257
第四节 同一时期中日女教育家及其女子学校的比较	263
参考文献	272
附录	287
后记	309

第1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仿效欧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建立近代化体制。教育也不例外。从1872年《学制》颁布起，日本逐步确立了近代化的教育体制，同时拉开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发展的帷幕。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知识水平，提高了国民整体素质，还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女教育家。她们兴办女子学校，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进程，在日本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本书之所以选择近代日本女教育家及其女子学校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近代日本女教育家 的教育实践活动有力推动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进程，而她们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近代日本的教育体制与理念，因而，对近代日本女教育家及女子学校的研究，不仅是日本教育研究以及女性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研究日本近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明治维新后，欧美各国的女子教育思想源源不断流入日本，使日本政府认识到发展女子教育和

提高母亲素质的重要性，于是制定了第一个教育法令《学制》，确立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此后，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教育令》、《小学校令》、《高等女学校令》，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女子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制度，使近代日本的女子教育事业取得了迅速发展。教育离不开教育者，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女教育家以及她们的学校。近代日本不仅产生了一批女教育家，而且她们还兴办了许多女子学校，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女性，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如1875年，即在《学制》颁布后的第三年，跡见花蹊创办了跡见女子学校，开创了近代日本由日本女性自办女子学校的历史，在日本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后，女教育家们创办的女子学校不断涌现。1900年女教育家吉冈弥生和津田梅子相继创立了东京女医学校和女子英学塾，其中东京女医学校为日本女性打开了医生职业领域，^①而女子英学塾则开启了女子高等教育之门，^②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这些女教育家们不仅创办女子学校，还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提出了自己的女子教育理念，反映了近代日本教育体制的演变过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同时她们创立的女子学校不仅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弥补了当时社会女学的不足，而且为战后女子教育的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时至今日，女教育家们创办的女子学校在女子教育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看来，近代日本女教育家及其女子学校的发展，推动了日本的女子教育事业，在日本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深入研究和探讨的价值。

其次，通过考察近代日本女教育家及其女子学校的发展，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梳理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轨迹，还可以透视出女性对教育的推动作用，从而把握近代日本女性的社会状况及地位。女性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为人类繁衍与社会发展的重任。但长期以来，女性一直处于父权制社会的压制之下，接受的是维护男性世界，维持以男性为社会主体的思想熏陶，从而被剥夺了女性应有的地位，女性也因此无法体现其存在的价值。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

① 平塚益德《以人物为中心的女子教育史》，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65年版，第26页。

② 平塚益德《以人物为中心的女子教育史》，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65年版，第231页。

在。日本也是如此。近代以前的日本女性深受儒家传统妇道伦理思想的禁锢，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完全受制于男性，处于绝对服从男性的被支配地位，完全失去了自我，更不用说去实现其价值。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近代教育的确立，女子获得了与男子同等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开始摆脱传统妇道伦理的束缚，接受先进的知识和教养，从教育中得益。19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女子的小学入学率仅为15%，而在1907年就上升到了94.16%，^①并已经实现了四年制的义务教育，开始朝着六年制义务教育的方向发展^②。在此过程中，一些受了教育的日本女性，认识到教育对女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她们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现实的教育状况，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并将它们付诸于教育实践之中，推动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显示出女性在教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进一步揭示了女性在社会各方面的存在价值。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和限制，近代女性的价值体现也具有局限性。女教育家的教育业绩虽然有力推动了教育事业尤其是女子教育的发展，但她们提出的教育理念大多偏重于女性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强调良妻贤母主义教育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女性本身独立人格和自由，从而使得她们在教育中的作用带有狭隘的一面，制约了一定的价值体现。但尽管如此，也不能抹杀她们对教育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她们的教育活动不仅显现了女性在教育领域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折射出近代日本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值得我们去探究。

最后，通过对近代日本女教育家及其女子学校的考察，反思近代中国的女教育家及女子学校。近代以来，日本发达的女子教育与落后的中国女子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差距同样出现在两国的女教育家及女子学校的发展上。1875年，女教育家跡见花蹊创办第一所由日本女性自办的女子学校时，中国不仅没有自己的女子学校，就连倡导女子教育的人都几乎不存在。19世纪末期，日本开始发展女子中等教育，并不断涌现女性创办的女子学校时，中国才在1898年5月诞生

^① 文部省《学制百年史 资料篇》，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5年版，第295页。

^② 日本在1907年3月修改了小学校令，将义务教育延长为六年，于1908年4月开始正式付诸实施。